



哲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初探

变

ZHIXUE DE
BIANGE

革

丁祯彦 著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初探

变革

ZHIXUE DE
BIANGE

丁祯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 晓 阳

哲学，这个曾经被误解为“无用”的学科，而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宗教、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哲学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然而，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本书旨在探讨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哲学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哲学的本质与功能，第二章探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第三章探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第四章探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第五章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本书力求做到观点新颖、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是一本值得哲学爱好者阅读的好书。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力求做到观点新颖、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哲学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初探

丁 桢 彦 著

星元年 2001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9,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8-02975-X/B·254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导 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	(1)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	(20)
一 “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状况	(20)
二 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	(27)
三 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34)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欧洲文化背景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之比较研究	(42)

第二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理论特色	(52)
一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	(53)
二 三次论战的哲学意义	(65)
三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82)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理论特色	(9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

- (109)
-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
实质与核心..... (109)
- 二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中国革命
道路的可贵探索..... (115)
- 三 在探索中国革命特殊道路过程中, 毛泽东哲学思
想形成雏形..... (126)
- 四 艾思奇、李达在普及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走向
中国化..... (134)
- 五 30 年代思想理论上的论战 (149)

第四章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169)

- 一 《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170)
- 二 “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180)
-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190)
-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207)

结束语..... (222)

附录(一) 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 本思想..... (230)

附录(二)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孙中山、毛泽东到 邓小平..... (242)

后 记..... (273)

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可以说是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就提出来了。为了从理论上正确回答和在实践中处理好这一问题,人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作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诸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得时贤的指正。

据查,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来自 1898 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899 年广学会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万国公报》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文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新学者”。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还没有形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9 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此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它的指导下,2 年后(1921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8 年

后(1927年)建立了人民的军队,仅用了30年时间(1949年)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成为占指导地位的思想,其传播的迅速,在思想文化史上是少见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在—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化)并取得胜利?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社会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前后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种需要,如果当时中国社会没有这种需要,即使再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中国社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变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逐步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哪里有矛盾,有斗争,哪里就有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中国人民实行民族压迫,使中国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中愈陷愈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要在中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理论来指导。综观鸦片战争后80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给终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

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之学,革命农民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哲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天演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突驾”、“飞跃”为主要内容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等等,虽然它们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恰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②。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先进分子把眼光转向俄国,请来了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第二,社会已有了一股新的力量。任何思想的传播总是靠人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一股力量,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分子。他们迫切地要求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以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理论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担当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以便适应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时代要求。

应该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力量,他们

①②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都是些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些叱咤风云、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既是革命者,不少人还是职业革命家,又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学有成就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政治上由激进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上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像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幼时熟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以后学习西学,最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学贯中西的特点,为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从理论渊源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有它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有它的理论契机。“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除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它的需要外,还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分不开。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中国人较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中国化的深层的理论契机。

这里接触到一个文化传播学上的重要问题: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原有思想文化如何相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中国文化发展来说,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外来思想传入,一次是佛学(佛教),一次是“西学”。印度佛学东汉时传入中国,起初依附于道术而得到发展,后来逐步地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结合起来,最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佛学中国化首先表现为玄学化(魏晋时期),而后是儒学化,唐代禅宗南宗(慧能)的盛行标志着佛学儒学化的完成。

从中西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经过日本、俄国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同样要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解决两个

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在理论上,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腐朽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密切相联。理论(哲学理论、政治理论等)与实践结合,一般(共性)与特殊(个性)相结合,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实质和核心,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

二

就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说,中国革命不仅与西欧各国不同,就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列宁早就看到了。他在1919年11月22日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

你们这些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未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①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

列宁的论述明确了三个思想：第一，东方各国（中国是东方一大国）由于国情不同，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不同，因此，它的革命道路自然也不同于欧洲和俄国无产者的道路；第二，革命没有统一的“方式”（模式、方法、途径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原理”，“找到特殊的形式”，以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第三，“共产主义的书本”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总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在“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极有指导意义。

正是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奋斗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解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由于这方面的问题时贤也有共识，在此就不再论述了。

三

现在要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不少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是近代科学文明的结晶，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二者之间谈不上结合。

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是产生在不同时代,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世界观,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异”中没有“同”。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第二,就中国古代哲学本身说,它也有二重性,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也有超时代、超民族性的一面。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还面临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如改造自然、治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提高人的自身素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往往超出了时代、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容、相通的地方,二者有内在的联系,有结合的可能。

下面我们就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以来就围绕“天人”、“名实”之辩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得到持续发展。中国哲学这一优良传统体现了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基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运动,生动地说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普遍规律。这样,中国哲学经过批判的总结,就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被利用来对人们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借助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得到通俗的表达,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

就认识论和逻辑学来说,先秦围绕“名实”之辩已经概括出一些唯物论反映论原理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孔子讲“正名”,

虽有先验论的倾向,但他“不语怪、力、乱、神”^①,却是理性的态度。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②这是对待知识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时接触到了认识过程中“知”与“不知”的矛盾,含有辩证法因素。墨子讲“名取予实”,强调概念应受到实践经验的检验。老子的“无名”论,虽有否定名言的倾向,但老子和庄子都看到了感觉和理性在把握宇宙的统一原理和发展法则上的不足处,有积极因素。荀子肯定知识和才能是后天获得的,认识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积累过程,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知和行的对立统一运动。荀子和《易传》还认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通过“解蔽”和正确地运用逻辑范畴,就能获得比较全面的真理。秦汉以后,王充、范缜、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围绕“形神”、“能所”、“心物”、“知行”诸问题的辩论,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有所发展。

在逻辑学方面,先秦墨家已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在辩证逻辑方面,老子提出了否定的原理,到了荀子和《易传》,朴素辩证逻辑已具有了雏形。以后,张载、沈括、朱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上均有很高的成就。沈括的科学方法充满着实事求是和辩证法,对宋元时期的科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夫之进一步揭示了“名、辞、推”的某些辩证性质,提出了“言、象、意、道”相统一的学说,批判了先天象数学、玄学、佛学和理学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要求从“物物相依”、“变化日新”中去把握实体,强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从而比前人更深刻地阐明了“类、故、理”等逻辑范畴。

所有这些成就,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为政》。

传统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胚芽;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区分精华和糟粕,这样就为基于实践而开展的认识辩证运动,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为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发展,找到了更加坚实的历史依据。

再就社会历史观、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来说,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自先秦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思想,其中有唯物主义因素。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各有其职分,不能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治乱(“治乱非天”);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使人类有力量去控制自然。他还提出“明分使群”说,试图从物质财富的分配来说明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起源。唐代柳宗元讲“势”,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这一观点经过南宋哲学家叶适的发挥,到王夫之便发展为“理势合一”说的历史观,意味着已有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萌芽。这些虽然还不能说是唯物史观,但他们坚持从历史本身的演变来探讨历史的规律,无疑是合理的。

与社会历史观相联系的是社会理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这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之中。“大同”社会是古代儒家传说并向往的社会。后来,情况变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所代替。不过“大同”社会的理想,一直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改革家和人民向往的目标。直到近代康有为、孙中山,还以此为鼓舞改革和革命的口号。“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被介绍,人们好像又看到了似曾相识而又一心向往的东西,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主义理想与古代“大同”理想联系起来,说《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理想

的描写“确可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①。现在来看邵力子的说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融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既是欧洲文化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内在联系)。

与理想社会相联系的是理想人格。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都十分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他们本身也具有高尚的人格。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们,批评了传统的“道统”说,认为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并不体现在宋儒所推崇的道学家身上,宋儒推崇的道学家不过是“道学之乡愿”(黄宗羲语)。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认为中国人只要克服了自秦汉以来专制统治的弊端(“濯秦愚,刷宋耻”),就可以“取威万方,保延千祀”。这些都体现了进步思想家们个人高尚的品格以及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思想感情。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是中国人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因素。

从上述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只有对立而没有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有“异”也有“同”,二者的结合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传统哲学将得到科学的清理,克服自身的素朴性、片面性和某些神秘性,使之成为现代哲学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大量地从传统哲

① 邵力子:《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中国现代思想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0页。

学的优秀成分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就是古为今用,也就是“古”与“今”的辩证法。

四

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同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清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1938年春、夏所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有的反动哲学思想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继《反对本本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进一步阐述,他明确指出:(1)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的”,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因此,它要深入下去,要继续发展,必须与传统哲学相结合;(2)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思想上“树立批判的旗帜”,批判现有的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哲学思想,批判在清算古代哲学遗产中的各种错误观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批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优秀的哲学传统相结合。

就批判“现有的反动哲学思想”说,在三四十年代主要就是批判唯心主义的“道统”论和“力行哲学”。

“道统论”是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来的，他将帝王系统与圣哲系统相结合而形成“道统”，具有儒家政治理想与思想传统的特征，成为宋明儒学复兴的先声。北宋二程，南宋朱熹，对“道统”说均有所发挥。“道统”说是为封建剥削的腐朽统治服务的，特别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理论上的依据，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所批判。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作辩护的“道统”说，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被翻了出来，其代表人物就是打着继承孙中山旗号的戴季陶、陈立夫和蒋介石。

戴季陶在1925年所写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中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戴氏这些话不仅完全歪曲、篡改了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思想，硬将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说成是封建主义者和封建道统说的继承者；而且他的用心还在于论证他自己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是“正统思想”的“嫡传”，以便反对真正的三民主义、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继戴季陶之后，陈立夫宣扬“唯生论”，蒋介石提倡所谓“力行哲学”，都是以封建的道统说为其思想基础。

针对这些唯心主义的道统说，瞿秋白早在1925年就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见《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之后，范文澜、齐燕铭、艾思奇、胡绳等人也从各个方面批判了蒋介石、陈立夫的哲学思想。

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而这种唯心论的特点是以继承中国封建道统自居。蒋介石“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撑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的话，完全解释成为